

抱病北上：
为了中国的和平与统一

1924 年的中国并不太平。这一年的9月，南方爆发江浙战争；10月，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华大地兵火连城，军阀间打得不亦乐乎。正当直系大将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在山海关激战之时，北京城内却突发异动，原属直系阵营的冯玉祥一夜间倒戈相向，直系领袖、“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这就是民国史上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政变成功后，随即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后者接电后欣然同意，决定随即北上，以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正当孙先生整装待发时，北京政局再度发生变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兵临京津城下，冯玉祥的势力为之一弱。经过一番实力与权谋的斗争后，张、冯等人达成妥协，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被推任为临时执政。

段祺瑞上台后，其接过冯玉祥的口号并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以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作为补偿，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向孙中山先生发出联名邀请，请他迅速北上，商谈国是。孙先生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民国成立后一次极难得的机会，有望实行国家和平统一，于是立刻复电，表示将在数日后立即北上。

行前，孙中山发表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二是废除以往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北上途中，孙先生一直强调这两点，但段祺瑞在随后的施政纲领中宣布“尊重条约，外崇国信”，孙先生十分气恼，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又何必欢迎我！”话虽如此，孙中山仍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而继续北上，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入京。

1924 年 12 月 31 日，在天津停留了二十余天后，孙中山扶病前行。入京后，孙先生发表宣言，称自己“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因为病体不支，孙先生在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后，即再未公开露面。就在抵京当晚，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很快来到北京饭店，其与从天津过来的德国大夫施密特会同诊断后一致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情况不容乐观。



1924 年，孙中山先生同夫人由日本至天津时摄于船上。

孙中山的最后日子
『革命尚未成功』：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孙中山抵达天津后肝病发作，仍与各方人士商讨国事。

1924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等陪同下离开广州，之后经上海至日本神户访问。次月 4 日，一行人抵达天津。在津期间，孙先生因风寒而肝病复发，在疗养二十余日后，仍坚持于 12 月底前往北京。3 个月后，也就是 90 年前的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逝。在明知自己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孙先生为何要执意赴京？其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诊疗风波：
无意卷入中西医之争

5 日后，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等 7 人再次为孙中山会诊后建议施行手术，但后者只同意以内科方法治疗而不愿意手术，其原因有二：一是觉得自己的病情或许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二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孙先生仍希望进一步努力。医生们商议后，也只能尊重孙先生的意见。从这天起，孙中山开始接受注射治疗，最初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其病情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半个月，1 月 21 日后孙先生的病势骤然加重，德国医生克礼发现其眼球中有黄晕而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其他部位，于是立即会同其他医生，紧急商议手术方案。

1 月 26 日，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由北京饭店转入协和医院。当日下午 6 点，由外科主任邵乐尔为孙中山主刀，施行手术割治。孰料，在将孙先生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整个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而且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根本无法手术。在此情况下，邵大夫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并将肝部的脓吸出后即将伤口缝合，整个手术进行了 25 分钟。事后，德、美、俄三国医生对孙先生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结论是：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处晚期。据医生们的判断，孙先生的肝病至少已潜伏了 10 年以上，而孙本人也自述在 1916 年后时常感到胃部不舒服，但当时一直是当作胃病来治，这或许就是其肝癌

的肇始。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孙先生反应良好，但在短暂的稳定后，病情再度急转直下。2 月 16 日，院方在征得同意后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以阻止癌细胞蔓延，这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后办法了。遗憾的是，镭疗射近 45 小时后，病状仍未见任何好转，院方至此也是无能为力。

在此情况下，张静江等人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但汤尔和等西医坚决反对中医疗法，其所在的协和医院也态度强硬的表示，如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者，也不能例外。2 月 18 日，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轅，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数日后，孙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使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延至 3 月 12 日凌晨，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弥留之际，孙先生签署遗嘱并不断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9 时 30 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终年 59 岁。

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孙中山病危时曾谈起对中医的看法，“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孙中山不愿看中医并不奇怪，因其早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对中医有所抵触也在所难免。

孙先生病逝后，遗体被运回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并进行胸腔腹腔解剖。待新的检验报告出来后，医生们得出与此前不同的诊断结果，即认为孙先生的病是癌细胞侵入肝体后阻塞胆管，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所形成，其关键的病变部位在胆囊和胆管，即胆囊腺癌，但此刻为时已晚了。

伟人逝矣：
轰动一时的祭礼与移灵

孙中山逝世一周后，宋庆龄、孙科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一次家庭葬礼，葬礼由燕京大学神学院

院长刘廷芳牧师主持，广州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和孔祥熙先后致悼词。葬礼之后，孙中山灵柩被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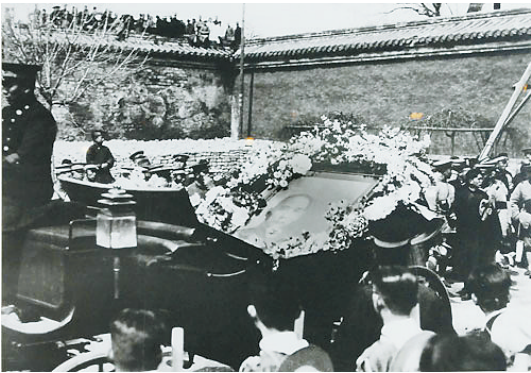
3 月 24 日起，社稷坛开始举行公祭并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据记载，孙先生的灵柩安放在灵堂内一座 50 厘米高的棕台上，灵柩前上方悬挂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边是孙先生的遗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棺上盖以青天白日旗，宋庆龄身着黑素服率亲属守灵。此后一周内，包括本国政要、各界名流及各国大使约 10 万余人前来吊唁，盛况空前。

由于孙中山病逝时陵墓还未动工，各方决定于中央公园公祭后将灵柩暂厝于西山碧云寺内。4 月 2 日上午，灵柩用汽车运送，下午 4 时到达碧云寺，灵柩安放在殿后的金刚宝座塔石龛内。经治丧处决定，马湘、黄雅觉率卫士李荣等 7 人常驻碧云寺护灵。

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至紫金山一带打猎时曾说，“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培土，以安躯壳尔……”按此，国民党方面经实地勘察后决定在此建陵。4 年后，中山陵竣工，此时正值北伐胜利，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并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命为中山传人的蒋介石决定为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奉安移灵大典。

1929 年 5 月 22 日，在碧云寺举行遗体改殓仪式后，国民党方面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奉安迎柩纪念大会，碧云寺内则另辟“孙中山纪念馆”及“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示纪念。5 月 26 日下午 5 时，移灵专车在礼炮声中离开前门火车站开往南京，沿途经天津、济南、泰安、徐州等站，各地方官员及民众举行隆重的路祭。

28 日上午 4 时，灵车抵达蚌埠车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人从南京来迎。是日上午 10 时，灵车抵达浦口车站，灵柩随后被转上“威胜”号军舰渡江。下午 3 时，灵车至中央党部礼堂，由杠夫 32 名奉移灵柩下车，举行停灵礼。6 月 1 日上午，灵柩运至紫金山麓，用杠夫 108 名。10 时 1 刻，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奉安典礼行礼如仪。礼成后，孔祥熙率杠夫敬奉灵棕移进墓门，鸣炮 101 响。奉安仪式结束后，宋庆龄率孙科夫妇等将墓门严闩。由是，经营数载、备极隆重的奉安大典遂告完成。🇨🇳



1925 年孙中山先生葬礼，摄于北京。